

抗敌演剧队引轰动

抗战开始后,母亲和赵丹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阿囡(即舞蹈家赵青)留在外婆家,两人一起作为抗敌演剧三队的成员,离开上海辗转演出。到达武汉、重庆后,继续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演出和宣传活动。

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受日本天皇和日军本部命令,对重庆实施联合大轰炸;没有前线和后方,不分军队和百姓;这种无差别轰炸,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到1943年8月23日止,达五年半之久)的战略和政略轰炸。母亲他们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先后演出《民族万岁》《塞上风云》《夜光杯》等剧目,将近一个月,轰动整个山城。之后,他们还和其他进步戏剧团体进行各种联合演出。

同年10月10日上午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第一届戏剧节开幕式。当天下午,母亲他们本想借卡车作舞台,进行流动演出;不料没有借到车。他们只能化好妆,打着“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街头演出队”的横幅,边走边演。这支队伍中,母亲演农妇,钱千里演汉奸,周峰扮土肥原,石羽演工人。由赵丹导演,并负责介绍剧情,孟君谋负责维持秩序。一路上他们把锣鼓敲得山响,引来成百上千的观众跟着他们走了十几里路,形成庞大的游行队伍。母亲他们沿途还演了《汉奸和十字舞》《争取最后胜利》和《大家一条心》等剧目。他们再向市中心行进时,街道两旁已挤满上万观众,大家疯传上海明星上街演戏的消息,都来观看,以致交通堵塞;到了晚上,他们还高举火把继续演出。这次街演成为山城市民广为传播的新闻,经历者都难以忘怀。

五天后的,我的母亲在重庆生下儿子赵矛(小名苗子)。

从憧憬到生离死别

1939年夏,母亲怀抱十个月的苗子,随赵丹和徐韬、王为一、朱今明三对夫妇,还有易烈,行程一个月,由重庆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据了解,当周恩来得知他们启程赴疆时,为避免他们受骗上当,曾派南方局政治

生命的感动(中)

——纪念我的母亲叶露茜诞辰一百周年

◆ 桂未明



■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叶露茜与爱人杜宣摄于长乐路寓所书房

部文委敌情研究组组长、作家冯乃超前去阻拦,但为时已晚,他们已从河西走廊,经星星峡,进入哈密。单纯热情,迷恋舞台的母亲一心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莫斯科大剧院,也希望在民族舞蹈发源地的新疆,能挖掘资源创造发展我国民族艺术表演体系;她怎么也想不到等着他们的是万劫不复的厄运。

她们入疆时带着憧憬;出疆时,生离死别,只剩寡母们带着身边的幼儿。赵丹等人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押后,母亲便拒绝演出。十八个月来,她按月给赵丹送去生活费、衣物以及自己爱看的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等文学名著,同时在监外奔走营救;没有探监,没有消息,从无望到绝望,内心所受的折磨和痛苦无法言说。但年轻的母亲没有退缩,没有被摧垮。1942年12月中旬一天,盛世才老婆邱毓芳找我母亲谈话,通知她赵丹已死,她们必须离疆。第二天一早盛世才不由分说就派兵

武装押送她们,乘着大卡车一路颠簸,走了半个多月,于次年一月到达兰州。为了生存,母亲沿途卖光了随身物品,包括结婚戒指,只剩身上一件御寒的黑色貂皮大衣。到了兰州,住在南关中国旅行社兰州招待所,并受到国民党军统局西北战区区长、少将主任、特务程一鸣的监视。程一鸣多次找母亲谈话,警告她不得离开兰州;中国旅行社也接到国民党西北战区统调室的“不可卖票给叶露茜”的通知。她当即与重庆的金山和宋之的电报联系,告知困境。母亲怎么能够甘心被困,她下定决心要逃离兰州。在友人陈宪武的帮助下她找到了工作。她一方面坚持为当地进步剧团排演抗战剧目;另一方面则去空军基地跳舞为名,悄悄寻找正在兰州进行隐蔽训练的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同乡飞行员联络,以便伺机逃跑(抗战时期流传“中国空军半广东”一说。“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是孙中山创

玄机无界



达世新

10. 赶去西昌

不多会儿当尤子奇回来时,凯莉的眼光正盯着手提电脑屏上的地图。“你看,这就是你看见不明飞行物的区域,现在街上有不少警方布置的摄像头,只要我们能弄到这些录像,就不难见到此人。现在整个世界其实都在监视之下。”

一束跃动的强光束剑般刺穿四川西部的茫茫夜幕,一列电气火车在崇山峻岭间风驰电掣般奔驰。这是T8865次直达列车,从成都一站不停地直奔西昌。这时,已过晚间十点,硬卧车厢里的照明灯已熄,钟波达和穿土黄色衬衫的年轻人隔着临窗小桌台还在轻声而热切地交谈着,在旁人看来他俩就像是亲兄弟。可有谁想到,几个小时前他俩还在成飞公司的试飞场外争执激烈。当钟波达在小饭店里突然发现这年轻人的包里有飞机铝片时,立刻怀疑他捡到了试飞飞机上掉落的金属片。

“小老弟,你得把它留下!”钟波达的语气不容商量。店老板也不依不饶。“凭什么?”小伙子又气又急。“我那东西不是这儿的!是P-25上的!”接着他便讲述了原委,原来这是他爷爷所驾战机的残片,坠毁于1940年惨烈的璧山空战中。那是日本零式飞机在中国战场的首次出战。我方竟然被打下了他心中的一团烈火、一支火炬!常常炙烤着他年轻的心,指引着他矢志投身于先进飞行器设计!

听了年轻人的叙说,钟波达和店老板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并了解到他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

“老哥是搞公安的吧?”店老板猜测道,“我看你这精神气就像!”钟波达笑笑:“说对一半,我是搞国家大安全的,是电视台的军事记者。”接着他一看手机时间,“啊,都7点半了!我要坐今晚9点的火车去西昌!”“哦,来得及!哎,军事记者大哥,你赶去西昌,莫不是看卫星发射吧?听到最近几天那儿又要打卫星了。”这倒让钟波达为难了,跟他明说吧,怕有

违国防科工委的规定,可又不忍对他撒谎。略一思量就拐了个弯说:“我也是听人说了想去看看,碰碰运气,碰不上到西昌转一圈也不错。”没想到这话引来了年轻人的极大兴趣:“那我也去看看,航空与航天紧密相连,与我的设计项目又很有关系!”“是吗?”钟波达闻言心中一动,“那好啊,赶紧吃完饭就跟我走,你的路费我包了!”“那感情好,这大哥仗义!我这就给你们再包几个咸鸭蛋去!”

此刻,钟波达和小伙子在硬卧车厢里对坐在临窗的小桌板两头,一边剥着店老板送的花生一边热切地交谈着。他俩从世界第一架飞机发明者莱特到我国的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冯如,再谈到了钱学森对空气动力学理论和贡献……两人尽管年龄相差甚多,知识背景不同,但谈起空军、谈起国际上的相关装备来真可谓“逢知己千杯少”,可惜只有矿泉水。

外面的夜色朦胧中,山势新高。清晨列车即到达西昌。

就在秋日的朝阳照在了西昌年轻人忻飞身上的时候,相隔数千里外的尤子奇也惬意地感受到了阳光的暖意,他和凯莉正坐在上海万豪酒店里用早餐。他打电话给陈苏红说:“这样啊,达哥不在上海,我只好找嫂子你啦!……我在哪呢?我在万豪酒店的餐厅里……什么,你看见我了?”

在尤子奇吃惊得脑袋像雷达乱转的时候,电话里的陈苏红爽朗地笑了:“我是在斜对面的中凯酒店,我看得见你们餐厅的窗子!你现在就过来吧。”

“OK。”不多会儿,尤子奇带着凯莉来到了中凯酒店的顶层,他看到绿意盎然的庭院周围有几间中小型房间可以谈事,他看到其中的一扇褐色玻璃门里陈苏红正跟一男一女谈着什么,那男的不是别人,正是几天前遇到过的林总!

门开后,陈苏红看到尤子奇后面还跟着个外国女子,不免有些惊讶。尤子奇赶紧做起介绍,随后他把眼光转向林总身边一位俏丽灵动的年轻女子,林之风介绍道:“这是我的秘书梦韵小姐。”陈苏红告诉尤子奇:“她是上戏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去年在电视台实习时钟波达当过她的带教老师。”

尤子奇边坐边问:“哎,梦韵小姐,你怎么没到电视台工作,反倒转行了?”

24. 分配到工矿

1968年8月,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所有的六六届毕业生全都接到通知来到了学校,坐在各自班级的教室里收听拉线广播。广播中的一个男中音不带表情地在缓缓宣读着名单。一遍读完了,接着又重读了一遍。第二遍重复名单读完了,广播喇叭里一片可怕的沉默。当终于有了声音的时候,已经换成了一个女高音。多少年以后,同学们都能回忆得出那一字一顿的宣判式语言:“同学们请注意了,刚才没有报到姓名的,全部分配到上海工矿……”

教室里的氛围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人人都有一种茫然失措或者是不敢相信的感觉掠过了心头直轰头顶——是大喜还是大悲?是心碎还是狂欢?一瞬间,每个人都像丧失了语言功能丧失了思维能力。好久,才有一个至今也想起名字的女同学冷不丁地大声问了一句:“姚老师,报到名字的同学……分配去向是——”

班主任姚老师也是愣了一会才答出两个字来:“农村。”这两个字宛如点燃了巨大的炸药引信,还没落地,教室里已经掀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浪:有人号啕大哭,有人尖声狂叫,有人一脚踢翻了课桌椅……这场面,整一个的是“天下大乱”!

因受高度近视的连累,我的毕业生材料送了退,退了送,被各大工业局的企业单位一次又一次打回原形退了回来。还记得在无量无月的晚上,和同样遭遇的同学几次去到毕工组送材料老师的家询问消息,那老师好像姓蔡,无奈均无功而返。有一天一早,一个女同学挎着买菜竹篮在楼下大声叫着我的名字,问录取通知有消息了吗?唉,哪有呵!

有同学来叫我去学校一趟,姚老师找我。当即赶了去,姚老师正在操场上打排球。笑吟吟地告诉我,说录取通知来了,是上海铝材厂。喜出望外。

排排日子,我是12月12日去厂里报到,而相距九天后的12月21日实行的“一片红”新政策,则一律不由分说地让所有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这对我个人而言,是否过于幸运?是,是幸运得额头角碰上了天花板!但是,大凡过于幸运的事情,总不可避免

办的国内第一所航空学校。1924年12月至1938年底止,共培养了四百五十四名男女飞行员)。三个月后,她收到了周恩来委托金山汇来的路费,随即和四岁的苗子搭乘八大队的军用飞机离开兰州,回到重庆,重返艺术舞台。那时重庆已为赵丹开过追悼会。

父母亲的秘密工作

后来,母亲认识了我的父亲杜宣。经组织安排,她用演员的身份为我父亲的地下工作做掩护。当她和我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她的生活就开始了改变;她从台前退到幕后,隐蔽自己;从此,“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知道的也不能说”是她坚守的生活信条,甚至也影响了她的弟弟妹妹的一辈子。

1945年8月底,我的父母被派遣到香港后,12月我出生在跑马地养和园医院,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登记证上我没有名字,他们叫我“囡囡”。一年后我的大弟弟在铜锣湾圣保罗医院出世,他也没有大名。我们都叫他“弟弟”。父亲当时的身份是纽约企业公司宇宙俱乐部的常务董事(后又担任香港大千出版社社长、南国大酒店董事长)。为配合父亲的工作,母亲在中共港澳特委的领导下,筹建了港九妇女联谊会,并担任主席,为团结港九上层人士家属。1946年2月,在潘汉年和我父亲的介绍下,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于一年后转正。

上海解放前夕,母亲奉命回上海为上海局书记刘晓做掩护。于是,1948年冬天,带着我和大弟未殊乘坐尼罗号邮船先期离开香港。母亲是晕船的,理应平躺,但我们又小,不能老关在船舱里。她只能在甲板上,用两根带子把我和弟弟绑在她的椅子上,任凭我们自己玩。现在想来,当时上海到香港的交通,只有轮船;她担任沪港秘密交通员,如此往来是很辛苦的,何况这工作本身就具有危险性。

母亲从事的这些工作,她从未来对我们说起。去年,我还问过黑舅舅(叶小铿,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因为他长得黑,我们叫他黑舅舅),我们到了上海,住在外婆家,妈妈又做了些什么?他说,是张胖子接她的,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有幕后故事。问题是当事人可能并不知道。我也是事后很久才知道,是铝材厂一头头帮了我——不,换一个词汇应该说是救了我。他是接收新工人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在杨浦红专学院看到了我的分配材料,但并没有当场收下,仅仅记下了我在工人新村住址的门牌号码。回家之后问了儿子,认得几号几室一个叫管新生的人吗?这个人怎么样?肯定是回答让他满意了,这才于次日重返红专学院材料组,接收了我。

呵呵,何其不幸中之大幸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工人新村救了我。这是缘?还是命?唯有天晓得。后来才知道,他就住在工人新村旁的一幢本地房子内,本地人,王姓,没记错的话叫王汉诚。

说来也巧,就在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刚从学校回到家里,便听母亲说,有一个报馆里的人来找我,见我不在,便留下了一张纸条,刚走。那时节闲在家里没事干,便搬个小板凳坐在屋山头像模像样地在稿纸上胡乱涂鸦,而后装进信封投入邮筒投稿,将信封剪去一角,连邮票也不用贴,由报社“邮资总付”。我接过了纸条,至今还记得上面的大意,他说他是原《少年报》报社的张秋生,去看望一个朋友路过此地,想来看看我,并说我一则儿歌稿件被采用了,现留下一份校样,听我母亲说我是六六届毕业生,很关心我的毕业分配有没有消息。未遇为憾。我仅扫了一眼,慌忙奔了出去追赶,母亲在身后喊着说,那个人的个子很高的……

在屋山头,我终于追上了个子很高的张秋生,并一路将他送到了公交车站。他和我说了很多很多,从学习创作到进厂当学徒,鼓励我坚持文学创作,很让我感动。这是我创作道路上相识的第一位编辑。

两天后,1968年12月3日,我的处女作见报了。尽管仅是小小的四行儿歌,但足以让一个处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文学青年看到了地平线上初升的那一抹阳光,而且灿然无比。

工厂通知来了,作品见报了,这是不是该称作“双喜临门”?

工人新村

管新生

